

汉代四神规矩镜简述

□ 孙丽华

汉代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,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深深地吸引着研究汉文化的东西方学者,促使他们不断深入地进行研究。尤其是汉代铜镜,无疑是汉文化最具影响力和最具代表性的作品。汉代铜镜制作精良,图纹华丽,铭文丰富,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,其流行程度、铸造技术、艺术风格等几个方面都超过了前代。汉镜从艺术构图上,有别于战国多层次的纹饰表现手法(图一),若从铜镜上简明的锯齿(单线、复线)、双线、双线三角、流云纹上来看,好像是一种简单的装饰,其实它涵盖着很深的文化元素在里面,体现了汉代人对于审美的追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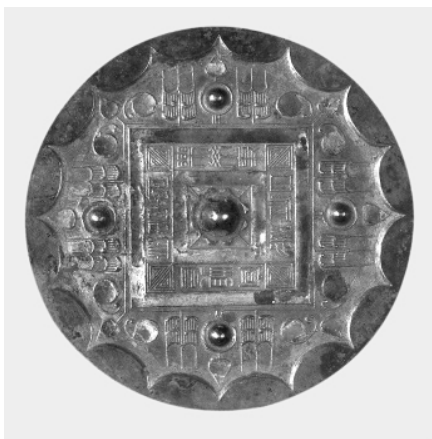
在出土的汉代众多青铜镜品种中,四神规矩镜(四神博局镜)大概是文博界、考古界以及铜镜收藏界最熟悉的镜种。本文试对四神规矩镜及其铭文(四神博局镜)作一简要阐述。

镜品种,尤其在西汉晚期和新莽时期最为盛行(图二、图三)。规矩镜布局整齐严谨,纹饰清晰:镜钮外一个方格,有时方格内会有铭文带,方格四边中点各出一T形纹饰,与其相对为L形纹饰,方格四角外相对V形纹饰,TLV纹饰间一般为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四灵以及羽人、瑞兽、乳钉纹等。

四神规矩镜(四神博局镜)在欧美艺术品收藏界称之为“TLV纹镜”,国内和日本学者称之为“规矩纹镜”。它的命名可能源自木工做活时使用的工具。人们将“V”形符号纹饰称其为“规”。规是画圆用的工具,今天称之为圆规。早在商代中期人们就已熟练地应用圆规。与“T”形纹饰正对的“L”形纹饰,被人们称之为“矩”。矩是角尺,是木工刨方形木料时用来画线或测量的工具。相传古代伏羲氏发明了矩,从而教化人们做用具、盖房屋。

在我国有关编著中,规矩镜的命名最早见于1942年梁上椿编撰的《岩窟藏镜》一书,梁氏称:

四神规矩镜(四神博局镜)是汉代流行的铜



图一 四乳草叶纹铜镜 洛阳博物馆藏



图二 汉代博局纹镜 故宫博物院藏



图三 四神规矩镜

“外人称为 TLV 式，国人则以字命名。梅原氏谓为方格规矩云。”梅原氏是日本学者梅原末治。由此可知，首先为“规矩镜”定名的，是日本学者梅原末治先生。自从梁上椿将“规矩镜”的名称引入之后，得到我国学者的普遍接受和采用，原因就是此三种纹饰皆类似于木工用具的“规”和“矩”，且“规矩”二字比英文字母“TLV”更易被中国人所牢记。

二

“TLV”纹镜以及镜内吉祥庆祷的铭文，曾让许多学者煞费脑筋，又曾使许多鉴赏家为之倾倒。古董市场有句顺口溜：“一方规矩镜，不惜掷千金。”小小的“TLV”纹饰符号却引来了洋洋万言的研究文章，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有学者说它是早期铜镜纹饰演变而成的，有的说它是由古代游戏六博演变而来的。笔者倾向于古代博戏是规矩镜的现实来源。1981 年在日本举办的《中山王国文物展》图录说明中，举办方认为：“汉代所谓规矩镜，实际上是六博。”湖南考古学家熊传薪也提出把规矩镜改称“博局纹镜”^[1]。规矩镜的纹饰起源于博戏，体现了艺术源于生活，是现实生活的反映。

汉代出土的铜镜中，博局纹镜（规矩纹镜）数量之大，这与汉代民间博局游戏的流行息息相关。博戏在春秋战国时期相当普及，为民间最盛行的游戏之一，正如孔子曰：“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，难矣哉！不有博奕者乎？为之，犹贤乎已。”^[2]

孔子认为整天吃饱了饭，什么事都不用心，不如去做博戏和下棋的游戏，做这种游戏，也比闲着好。到了汉代，博戏发展到鼎盛时期，如西汉初许博昌著《大博经》^[3]；西汉末年“迟昭平能说博经”^[4]；东汉也著有《博经》。此外，汉代有以博戏为业的人，叫“博徒”。《后汉书·王充传》记载今人“以游博持掩为事”，《后汉书·列女传》记载许升“少为博徒”，《三国志·魏书·韦曜传》记载“今世之人多不务经术，好玩博奕，废事弃业，忘寝与食”，博戏为群众所喜爱的程度可见一斑。汉墓中博的随葬品，就是汉代博戏盛行的证据。1979 年马王堆 3 号西汉墓出土了一套六博具，其中博局由四块梯形和两块三角形木板拼成，遍体髹黑漆，其上再以朱色双线勾出格道和图案。博局纹镜的广泛流行正是博戏盛行之时，博戏衰落导致了博局纹镜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。

三

博局纹铜镜不仅有纹饰，而且还带有铭文（铭文指的是铸在铜镜背面的文字）。有铭铜镜从战国末期开始出现，到了西汉时期铜镜铭文获得了长足的发展，铭文开始成为铜镜中的主要部分。汉镜铭文不仅继承战国镜的传统设计，而且具有装饰性，又有防伪标志，同时也打破了战国时期纹样的单一化。汉代的铜镜铭文，数量众多，形式多样，内容丰富，是鉴定汉镜的重要依据。有趣的是，铭文上的书法都是精美的悬针篆^[5]，在每个字之间常常用符号来装饰，这样也具有很好填补作用，来衬托整体的美观。铭文上西汉早期继承战国镜镜内的设计，铭文多出现在钮座外，句法往往加“兮”字，比较接近楚辞的文风。西汉中期开始出现条带式的铭文、字体瘦长的铭文。这时铭文的字体笔书，大多数一反汉初严谨不苟的作风，出现了代用字、简笔字及句中缺字等现象。这种状况之所以能被社会习俗接受，是因为简字、代字在当时大众中已广为流传，故凡遇到笔画较繁或文字较生涩的字，多以简字来代替。如最习见的“古”代“贾”，“守”代“兽”，“次”代“饮”，“周”代“雕”等。西汉晚期到东汉初年字体稍显方正，镜缘也较西汉中期稍宽^[6]，镜铭字体近

（下转 13 页）

个,这是最符合实际、最恰当的测点。因此,以不同的测点来说明秦陵的高度,本身就是一个误区,由此得出的各种数据,也就缺乏客观依据了。测点说的误区应该结束了。

以这一点实测秦陵高度约为36米,与秦代十五丈相差无几。这与文献记载的“高五十余丈”有较大出入,因此,有学者推测,可能是史书记载有误^[12]。关于这一问题的深一步详细论证,可参考武丽娜女士的《秦始皇陵封土高度问题试探》^[13]一文。此不赘述。

[1]秦始皇帝陵博物院、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《秦始皇帝陵园北门勘探简报》,《文物》2010年第6期。

[2]目前学界对秦始皇陵园外城北门存在不同的认识,但是大多数学者均认为陵园设有北门,其位置也应该在陵园外城北墙的居中部位,许多论文、报告所引用的陵园平面图均是基于此类认识而标注了北门的位置。

[3][9][11]陕西省考古研究所、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《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(2000)》,文物出版社,2006年。

[4]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考古队《秦始皇陵园北侧夯土遗迹调查简报》,《秦陵秦俑研究动态》2008年第2期。

[5]数据来源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、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《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(1999)》,科学出版社,2000年。陕西省考古研究所、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《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(2000)》,文物出版社,2006年。

[6][7]袁仲一《秦始皇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》,陕西人民出版社,2002年。

[8][12]刘占成《秦始皇陵究竟有多高》,《秦陵秦俑研究动态》1998年第4期;刘占成《秦始皇帝与秦始皇陵布局》,上海博物馆编《周秦汉唐研究论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8年。

[10]从考古发现来看,秦陵周围包括规模宏大的秦俑坑、位于封土之下的铜车马坑在内的众多大型陪葬坑均已建好填埋,较这些陪葬坑地位更重要的封土复土工程是断难不会完工的。

[13]武丽娜《秦始皇陵封土高度问题试探》,《文博》2009年第5期。

(作者系陕西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副研究馆员)

(上接25页)

汉隶寓有小篆笔意,虽还有简画省笔,但比西汉文体更接近书写文体。东汉中期以后,铭文加上纪年,为判断时代提供了依据,其中有纪氏铭文或纪名铭文。

西汉初期是铜镜铭文的萌芽时代,文辞简略,依其内容可分为三类:一是男女或朋友间的纪念赠答铭文,措辞委婉曲折,如怨如慕,意味深长,有纪念相思勿忘而兼含颂祷之意。二是庆祝颂祷铭文,种类少,但数量多,当时十分盛行,如“大乐富贵”、“千秋万岁”、“宜酒食”等。三是具有修养的意义而用作规箴的铭文,铭文较长,分铸于内外铭带。

西汉中期至东汉时期铜镜铭文种类繁多,照文意性质,可分为三类:一是赠答铭文,有属于男女或朋友关系的纪念辞,又有意义深长、耐人玩味、脍炙人口的妇女赠送其远行丈夫的语句。二是用于吉祥庆祷的,或歌功颂德、宣示威武的铭文。三是宗教神话内容的铭文。另外,受道家影

响,镜铭中常有仙人、芝草等铭词,非常流行,字句多为七言或四言、三言,文体大率相似,它对研究七言体的出现很有价值。

四神规矩镜图案构造和镜体铭文书体的演变、内容的变化,对于深入研究汉代艺术发展、人文思想、社会习俗,了解书体演变规律、洞察各历史时期社会思想意识变化有着重要的意义。

[1]熊传薪《谈马王堆3号西汉墓出土的陆博》,《文物》1979年第4期。

[2]《四书全译·论语·阳货第十七》,贵州人民出版社,1988年。

[3]《西京杂记》卷下。

[4]《汉书·王莽传》下。

[5]王纲怀《葬式铭文镜》,《收藏家》2008年第8期。

[6]卫琪《略谈汉代铜镜的装饰纹样》,《苏州大学学报》2005年第3期。

(作者工作单位:安徽省阜阳市文物管理所)